▼三味斋

# “视听文明”时代的文学如何生存

□陈晓明

今天，从数量上来说，并不能说文学处于没落萧条状态，每年出版社出版的纸媒印刷的文学作品有几千部之多，这与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是文学黄金时代的长篇小说相比，无疑多了几十倍。但80年代是期刊时代，一家文学期刊动辄几十万的发行量。到了90年代，文学期刊能保住10万印数的已经屈指可数，到了21世纪初，能保住数万份发行量的已经是凤毛麟角。长篇小说的繁荣并成为文学的主流，表明当代印刷业的旺盛，纸张的生产和使用更加便捷，根本上还是建立在经济发达的基础上。社会转型，经济转型，消费社会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必然引起阅读方式的改变。而文学在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改变，并不是文学自身的内容或形式发生了多大变化，而是社会的变化导致文学的作用力和影响力发生改变，文学的阅读方式和传播方式也必然发生改变。马克思的教导依然适用：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上层建筑或迟或早都要发生变化。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时期，文学在那个时期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都不是一个常态。文学以其虚构与纪实的暧昧方式，可以在言论空间极其狭窄的时期起到表达人民愿望的作用。文学实际上替代了新闻、社会报告、民情反映的功能。如今，这些功能已经不需要文学来承担，有着更为专业的信息渠道来传递社会愿望和民众需要。尽管依然相当有限，但在许可的限度内，新闻媒体、行政部门、专业机构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改革愿望的表现，无疑比文学更专业更全面也更便捷。所以，今天再以文学对社会现实的作用来衡量文学的意义和价值，那无疑是南辕北辙。

今天我们不得不以“剩余的文学性”来定位，是因为文学的历史发生了变化，历史中的文学发生了变化。今天的文学再也不是“五四”白话文学运动时期的朝气蓬勃的文学；也不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也不是20世纪80年代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驱动器；甚至也不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汉语言白话文学的艺术性探索的先锋。今天

的文学就是文学本身，就是人们的兴趣爱好的一部分，或者是获得愉悦、获取知识以及提升修养的一种方式。“剩余的文学性”即是说，今天的文学的意义乃是历史剩余的一部分，乃是文学史剩余的一部分。

以上所说的实际上还是剩余的“文学”，剩余的“文学性”这一命题还是要在文学更为狭窄的语境中来讨论——就是要在“文学史的剩余”这一意义上来讨论。汉语白话文学100多年的历史，发展到今天，文学的各种艺术表现手法，以及文学语言的运用、风格的锤炼等等，都到了成熟的阶段，“文学性”按说更为充足，何以会是“剩余的”文学性？

这就在于：其一，文学的可能性的缩减。历经百年的文学自身的艺术变革，世界文学在艺术表现方法方面，在艺术表现力方面，都已经穷尽可能性，再也难以花样翻新，这就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实验小说家（如约翰·巴思）和批评家们（如苏珊·桑塔格）所说的“小说再也难花样翻新”。所有的文学的可能性，只能是一种剩余的可能性，文学性也只能是艺术表现力的可能性的剩余。其二，文学史有一个缩减的过程。随着文学与历史关系的缩减，文学史也在缩减。我们今天阐释文学的历史及现实语境更加狭小和有限，主要是围绕文学本身。

因此，我们可以做如此概括：其一，文学性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概念，依赖历史的、现实的语境来生成，生成宏大的无限性的文学性的历史语境已经不存在了，宏大的文学性——那种震撼人心的、集体共鸣的、崇高感的、激励人的文学性无法生成了。其二，只有纯粹的文学性，文学在自身的审美语境中生成的那种文学性，最小值的有限性的文学性——它是趣味式的、韵味式的、精致的、风格式的。

尽管今天的文学共同体可能要比20世纪90年代中期更为强大，文学积累的经验更加丰富、能量更加充足。但在今天，文化的全球化和多样化，影视与网络的超速发展，消费社会的迅速扩张，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等等，这些都使文学处于不利的境遇中。总之，在后工业化、后现代社会，文学处于困境中可能是其始终的命运。

需要强调的是，“剩余的文学性”（或者说文学史的剩余意义），并不是说今天的文学性意义不大，水准和价值不高。也许情形恰恰相反，剩余的文学性的意义可能并不小，水准与价值也许很高。

何以见得？剩余是历史和文学史给定的命运，文学自身无力改变如此境况，世界文学史都要面对这样一种命运，汉语文学概莫能外。但汉语文学有2000年的历史，现代白话文学历经百多年的革新变革，到最近30年得以休养生息，在文学的艺术本身上磨砺功夫，作为个体的中国作家这才有了三五十年的写作经验的积淀，这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独特的现象。不从中国文学自身的百年沧桑来理解汉语文学今天的境况，就不能准确地把握汉语文学的真实意义和价值。看看当今中坚的一批作家，实事求是地说，今天的汉语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这60多年的历史中，水准无疑是最高的。水准高是一回事，影响力（以及发挥社会作用）多大又是另一回事，因为后者并不能全然取决于文学本身，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环境与现实需要。

当然，今天的文学面临“剩余的”命运——如前所述，无疑与影视、图像、声音为主体的“视听”文化占据霸权地位有关。视听文化与第三次产业革命联系在一起，电视与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代文化与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以纸媒体承载的文字书写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命运之中。当然，互联网对文字的挤压还有待讨论，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互联网也可以作为文字的载体，甚至可以是文字几何级数增长的载体，如今传播的文字：博客、微博、电子邮件、短信以及无数的网站的文字书写，比任何文字占据信息传播的霸主地位的时代都要超出几百倍甚至几万倍，不能说互联网对文字书写构成排挤。但互联网改变了文字传播的权威性、神圣性的地位，它使文字传播变成一项极其简单便捷的信息传递，文字的工具化、符号化和信息载体的特性被发挥到极致，而传统文字的真理性、权威性、严肃性以及审美功能已经变得极其有限，只是在非常有限的空间才有如此特性。互联网传播无疑也给传统文学的传播提供了便捷，但相比互联网推动的其他符号和信息的传播，对传统文学的推动就只能是附带性质的了。

今天我们面临的电子化、数字化的影像、声音与互联网传播时代，可能真的是另一个文明时代，我们不妨称之为“视听文明”的时代，这是与传统的口传文明、书写文明不同的另一个文明时代。如果说口传文明对应的是农耕、游牧时代，书写文明对应的是机械工业化时代，视听文明对应的则是电子化的后工业时代。文学面临的最大难题则是：在视听文明时代如何生存下去？这一切不应该成为我们抛弃或逃离文学的理由，相反，正因为要面对一个新文明的挑战，我们才要困守文学和文字，要守望“剩余的文学性”——这是我们维系传统记忆、警惕视听文明可能灾变的一项义务和责任。

**（《守望剩余的文学性》，陈晓明著，新星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

▼书者言书

# 历史书如何常读常新

□杨奎松

这是一本旧书，也是一本新书。说它“旧”，是因为它写于1991年年初，距今已经有12个年头。说它“新”，是因为过去了12年，这期间赶着潮流写“国共关系史”，放眼“第三次国共合作”的书出了不知多少，少有扎扎实实地从史料出发的。因此，即使是经历了十几年被人抄来抄去的劫难，好在这只是一本具体研究和记述战时两党谈判经过的著作。它所披露的个别文献可以被抄袭，但是，离开了它所整理的系统的谈判史料及其背景分析，个别文献的历史意义通常并不能得到正确的解读。

一本好的历史书，要能够常读常新。因为这需要建立在比较扎实的史料研究的基础上，而无意为现实的某些政治目标服务。

但写作本书的遗憾，并不像有的大陆或台湾朋友那样，遗憾其思想性不强。因为本书写作时，笔者初涉国民党问题的研究，尚不知水深水浅，因而没有采取边叙边议的分析式写法，只是采取了较为稳妥的摆事实的写法。这注定是许多读者读起来不那么解渴的原因。但这种纪实性的写法也有它的好处，那就是它没有太多的倾向性，不会让一部分读者喜欢，一部分读者不满。像国共关系这样掺杂了太多历史和感情纠葛，至今两岸读者的看法还有对立，也许把基本的文献史料发掘出来，系统地予以全面的介绍，给读者更多的自我判断和自我思考的空间，比强调作者个人的看法会更有价值一些。

对本书的遗憾，是因为史料的问题。这本书写于十多年以前，那时还没有去过台湾，甚至还没有蹲过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因此利用的国民党方面的档案史料少之又少，再加上十几年前的写作还不够老到，行文不可避免会流露出一些倾向性，有的叙述上显得并不很客观。

此次受邀重印，自然要对太过明显的错误和倾向性加以修订，但是却并不试图在史料的平衡上乘机做一些功夫。这一方面是因为按照有关方面的规定，重印之书必须基本保持原书的内容，另一方面是因为笔者已接受了另写一本国共关系史的邀约，已不必再靠大力修改本书来弥补过去研究的不足了。更重要的其实也许是，当笔者重读本书时，还是相信，保持原有的叙事方式和写法，也还有其必要性。

何以这样说呢？

本书引用的两党谈判草案、提案、谈话录以及各自开具的初步谈判条件等等，数以百件计。而直接间接利用到的各种涉及谈判问题的来往信件、电报、报告、情报及会议记录之类，更是有上千之多。这些档案回忆史料固然多为共产党方面所保存，但据笔者此后十余年来利用五六次在台湾讲学、研究的机会，遍查其党史馆、国史馆所存档案，发现其保存下来的涉及到两党谈判问题的相关文献，还不及大陆方面保存下来的百分之一。对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档案的查阅，情况也大致如此。

当然，大量使用单方史料所反映的，在特定的立场、态度，甚至情绪影响下形成的指示、报告或其他文件，很容易给读者造成一种倾向性的印象。所以，利用重印的机会，尽可能地全面地引述资料，进行相应的文字处理，避免由此带来误读，自是一件应做的事情。

**（《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精装修订版），杨奎松著，新星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

▼短 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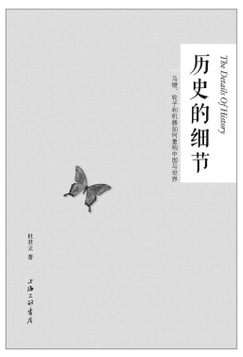
# 一沙一世界

□陶 林

对一粒沙的漠视，导致一个古老帝国的覆灭。这并不是一个关于蝴蝶效应的比喻，而是一个发生在历史进程中的事实，其中的奥秘就蕴藏在杜君立的新作《历史的细节》中。

这部书的副标题是“马镫、轮子和机器如何重构中国与世界”。作者以晓畅的文笔和草根的立场，介入到历史的现场，从马匹、车轮以及机器这样日常之物，揭示出历史的沧海桑田。

在马匹左右的世界里，马镫成为改变人类历史的动因。作者饶有兴致地为读者讲述了一个养马部落如何一步步征服中国，并开创专制历史的诡异历程，揭示了强盛一时的罗马帝国如何崩溃于马蹄之下，以及代表现代文明的民主精神又如何借助马背上的骑士一路走向世界……




如果说马匹是现代世界最原始的发动机，那么轮子就是现代文明最资深的传送带。按照作者的描写，轮子与马匹是同步进化的。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杜君立提出了一个类似李约瑟难题的悖论：轮子文化在西方文明中越来越强大，而在东方文明中却越来越孱弱。前者实现了人类的解放，从马匹到蒸汽机、内燃机，从马车到火车、汽车，人类走向自由。但在古老的东方，马却成为人的征服者，失去轮子的人们一步步衰落。

作为现代历史的塑造者，机器彻底改变了世界面貌和人类的命运。与马匹和轮子不同，现代机器是钢铁的产物，一切都来自沙粒中的那个世界：矿石、煤炭和石油。亿万年以来，沙粒中蕴含的巨大能量，一朝之间被现代人掘开了……

立足于对海量资料的翔实掌控与整合，作者细致入微地洞察到了历史在“器道”中的变异，让读者领略到“细节决定命运”的历史况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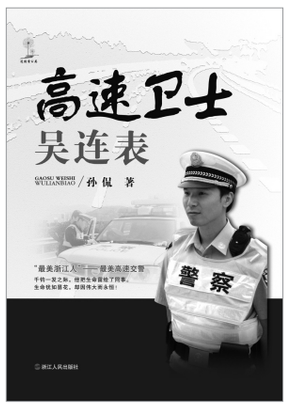
佛家有云，“一沙一世界”，或许历史并没有那么宏大遥远，也没有那么复杂阴暗。正如杜君立的《历史的细节》，人类历史其实就是一个“器道”越来越精良、“人道”越来越开明的过程。历史的核心其实还在于人本身。每个人都是地球一分子，惟有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互相尊重，和平相处，才是历史真正的归宿。

**（《历史的细节》，杜君立著，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5月出版）**

▼书 评

# 向平凡的伟大致敬

□李艺冰




“最美”是一种评价，更是一种赞扬、一种致敬。在不断涌现的“最美浙江人”之中，有一位身材并不高大、长相平凡、性格内向的人，却在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临危不惧、舍身忘己，把生命中最后的几秒留给了战友，自己甘愿被急驶的载重卡车撞下9米多高的高架桥，壮烈牺牲。当人们在追溯他的人生历程时，发现在高速交警岗位默默奉献7个年头的他，身上竟然有着无数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情系群众、以诚待人的感人故事。这点点滴滴的感人言行，平凡却真挚，琐碎且暖人，宛如一点点的光亮，聚集起来，即是一盏能够照亮人们心灵的灯……他是一位英雄，却如此平凡和普通，让我们感到一种可贵的亲切，并从内心深处发出由衷感叹：英雄可敬，英雄可学。

作家孙侃近年来致力于“最美人物”的报告文学创作，这部长达2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高速卫士吴连表》即是他的新作。这部作品不仅能让我们走近吴连表，了解其生平事迹，感受一个有血有肉、可亲可信的英雄，更让我们深刻理解英雄的本质，深悟英雄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和价值。把英雄写“真”，写“活”，写“透”，这便是这部文学作品的特点。

《高速卫士吴连表》共11章，从群众追悼英雄那感人肺腑的场面开始写起，在再现了英雄壮举之后，笔墨重点用在回溯他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描述他成为一名优秀人民警察的努力过程，以及平常对群众、对同事、对家人的关爱。

在风雪中，吴连表推着一辆辆滞留车辆，一干就是一整天，最后累得说不出话；在深夜里，他守在隧道口，一遍遍地提醒过往司机注意安全，由此放弃很多睡眠；过年时，吴连表毫无怨言地加班，值勤回来的他年夜饭只有一碗泡面；而在节假日，他一次又一次地放弃回苍南老家看望父母，端午节他刚准备好回老家，竟牺牲在工作岗位上……大量篇幅虽然用在了貌似零碎芜杂的事例中，但读起来只会令人掬泪；不少事例由英雄的战友、亲人娓娓道来，更加感人肺腑。作家孙侃说，在创作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的过程中，他越来越发现在叙述时，根本用不着使用艺术作品中常用的夸张、虚构之类的手段，而只需采用完全真实的写法，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英雄，真实地描写、塑造、歌颂，才是惟一的正确选择。

吴连表牺牲后的第15天，作家孙侃即投身于这部作品的采访写作。为了完美地完成这次创作任务，他曾进行了两个月时间的深入采访和资料收集，高速交警金华支队三大队、四大队、一大队；东阳、义乌、金华；英雄的殉职处，英雄一家三口曾经其乐融融的横店出租房……凡是吴连表生活的地方，都留下了孙侃的足迹。当时天气炎热，孙侃的左腿膝盖动完手术只有40多天，但他的采访积极性十分高涨，按着他的话来说，是因为“英雄的业绩一直感召着我，推动照我，我必须担当起这个神圣的使命”。正是因为他身临其境地沉浸在吴连表感人至深的无数故事和细节之中，才使得丰富的素材积案盈尺，使得他始终怀着满腔激情投身创作，使这部作品拥有较强的可读性、真实性、思想性和艺术性，也让我们觉得，英雄就在身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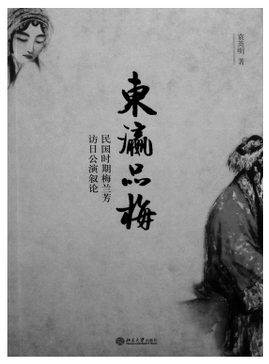
“你，在高空，瞭望着/整个的人类/把自己的指挥位置移到了空中/你用鹰的翅膀，把一个恒定的坐标/指示给我们/坚定的方向”。有位诗人用这样的诗句赞颂吴连表。英雄惊心动魄的奋力一推、默默无闻的无私奉献，向我们诠释了“最美”的魅力，体现了一种平凡的伟大，而这部作品以文学的形式记录了英雄业绩，是对英雄精神的礼赞，也表达了人们对于英雄的无尽敬意。

**（《高速卫士吴连表》，孙侃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

▼新书品荐

主持：李林荣

**《东瀛品梅》，袁英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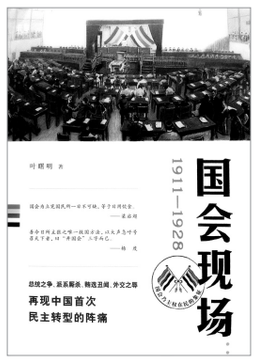



恰如本书副题“民国时期梅兰芳访日公演叙论”所称，这是一部对梅兰芳先生1919年和1924年两次访日公演史实作出细致追叙和深切评议的著作。全书正文四章，依托大量中日双边的书刊文献和图文资料，分别对梅兰芳两次访日公演的缘由背景、具体经过、社会反响，以及访问演出的成功因素，进行了脉络明晰、情境生动、信息详备的史实还原和观点梳理。附录六则，汇集梅兰芳访日公演剧目与角色分配、日本所藏梅兰芳舞台形象画像等相关史料。不同于同类著述，《东瀛品梅》在还原和评析史实两方面，都坚持了严谨实证的可贵态度。书中不仅处处凭史料说话，更为可贵的是对史料的采纳能够不回避争讼、不为尊者讳。在述评公演反响的“众生品梅”一章，专设一小节“批评、建议及争议”，明文征引，坦率分析。在介绍和讨论访日公演的背景、经过和事后社会文化效应的各篇章里，也多次展示“国耻日”风波、日本剧评针对梅兰芳表演和京剧艺术的某些非议的材料，析之以理，辨之以实，立场鲜明而不强人所难。或许，这正是身为梅派嫡传弟子的作者本人，不经意间显露在文字和学术世界中的一种不着粉墨的梅派风格：雍容大度，恬淡优雅。

**《1966-1976的地下文学》，杨健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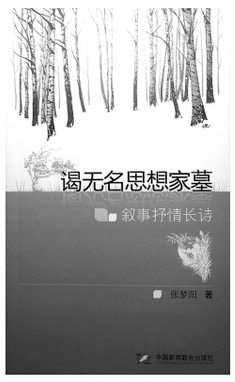
“1966-1976”这10年，曾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段荒芜期。这当然与史实不符。但这10年的文学状态和社会文化背景确实特殊。拨开“荒芜”、“空白”等情绪化修辞的遮蔽，如何认识这10年文学的本相，进而把握其流变、评价其得失？在20年前本书初次出版之前，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换句话说，《1966-1976的地下文学》这本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味。它处理的是一段在时间的坐标轴上已远远后退的文学岁月，但在文学历史的认识领域，它却开启了一扇通向未知和新知的大门。全书15章，30万字，基本依时序展开“1966-1976”10年文学的历史画卷。从“红卫兵文艺浪潮的兴起”开端，经“地下文艺沙龙”、“知青歌曲”、“军中地下文学”、“知青文学”的推动，再到“旧体诗词复兴”、“监禁文学”、“爱情文学和性文学”、“民间口头文学”、“狱中秘密写作”的波浪相逐，终至“丙辰清明节诗歌运动”的强音高奏，纵贯当代中国文坛10年之久的一脉渐行渐趋宏阔的“地下文学”潮流，赫然呈现出蔚为大观的全景图。得力于这本书的知识奠基和学术开拓，“1966-1976”10年文学的研究和阅读，近些年已在学界文坛的一角受到关注，但如今重读这本奠基、开拓之作新出的再版，许多章节篇目下的丰富内容和生动细节，仍然那么陌生和新鲜。

**《国会现场1911-1928》，叶曙明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




读史使人明智，“智”却常因“史”的不同而有差异。相形之下，上古史使人超迈，中古史使人激昂，近古史使人务实，读鸦片战争以降百年间的这段近现代史，则给人更多的是从层层叠叠的惨痛教训被动得来的一种深重遗憾。《国会现场1911-1928》选取的正是这段历史中的灰暗片段：民国初建，政体新定，表面看来举国上下万象更新，实际上国体与政体、精英与民众、人心与社会，都在幽暗中飘摇。作者整合海内外既存的相关史料、史著和当事人的传记、忆述等周边文献，以现象、事件的发生时间为经，以历史人物的性格、形象和心理刻画为纬，聚焦于“国会立宪”、“南方革命”、“联省自治”这明暗三重核心事端，把1911-1928年中国政坛和中国社会最黯淡也最纠结的一个侧面，细密而鲜活地再现到了近30万字的篇幅中。尽管在从各类历史资料向现在进行时态的叙述与刻画转化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着某些无法避免的局部差失，但就总体而言，建构在书中的“国会现场”及其远近背景中的关键人事，还是与从史料文献中散发出来的时代氛围相符的。许多有新意的史学研究结论，也得到了比较恰切的运用和整合。除了对当年的众生相给予了面目澄清，孙文、徐世昌、黎元洪、汤化龙、陈炯明等那一时代的诸多政治精英人物，在书中都有出乎今人意表之外、却落在史料实据之中的“新”表现。在所谓“民国范儿”日益流行成一个空洞符号的今天，像《国会现场1911-1928》这样重看历史、详解历史，而且一看一解之间新意迭出的厚实之作，其面世可谓正当其时。

**《谒无名思想家墓》，张梦阳著，中国新闻联合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




诗在中外，都同样有承担叙事的古老使命。及至现代，虽经小说、戏剧、影视等体裁的夺代，诗已多不以叙事为务，但诗体的叙事或者叙事的诗化，自有别的体裁所不及的特质，其中最重要的，大概是在如下两点上可以做到极致：一是结构上的删繁就简、凸显主干，二是主题上的直抵内心、彰显情志。《谒无名思想家墓》正是在这样两点上力求极致的一部纪实性质的叙事抒情长诗。全诗近两千行，包括引歌、尾歌与主体13篇。诗中所述之事，源自作者1970年代初在农村的亲身见闻：一位从名牌大学被开除回乡的“反动”读书人“苏格拉底”，偶然与作者结识，作者因此得以发现“苏格拉底”与村里地主之女“俏儿”的一段相濡以沫但注定不能圆满的爱情；作者和“苏格拉底”两人一起得到“重用”机会；作者忙赶往县里新单位报到，“苏格拉底”却坚决抵制，因言获罪，最终在关押中病故。与叙事部分紧相穿插的抒情句段，点染人事况味之余，闪现着作者对当时人情世态和整个社会环境逐渐深入的感悟、省思和批判。依序言所评，这部长诗是刺向社会不平和人们良心的双刃剑，它铭记了值得许多人回头审视的历史的一页。